

负性生活事件对非自杀性自伤的影响： 反刍思维的调节作用

林泽茜

浙江工业大学教育学院, 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8日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初中生负性生活事件NLE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SSI)之间的关系, 并检验不同类型反刍思维(积极型、消极型、低型)在该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采用方便取样法, 对福建省福州市某中学382名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 使用了《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渥太华自伤量表》(OSI)和《积极和消极反刍思维量表》(PANRS)。研究发现: (1) 负性生活事件与非自杀性自伤呈显著正相关; (2) 在三种反刍思维类型中, 仅消极反刍思维显著增强了负性生活事件对非自杀性自伤的正向预测作用, 而积极型和低型反刍思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结论认为, 负性生活事件是NSSI的风险因素, 而反刍思维的类型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调节角色。

关键词

初中生, 负性生活事件, 非自杀性自伤, 反刍思维

The Impact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o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The Moderating Role of Ruminative Thinking

Zexi Lin

School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July 2, 2026; accepted: August 17, 2026; published: August 28, 2026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life events (NLE)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examin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different types of

rumination (positive, negative, and low) in this relationship.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 questionnaires were administered to 382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a middle school in Fuzhou, Fujian Province, employing the Adolescent Stressful Life Events Checklist (ASLEC), the Ottawa Self-Injury Scale (OSI), and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Rumination Scale (PANRS). The findings revealed: (1)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2) among the three types of rumination, only negative rumination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o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whil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positive and low rumination were not significant. The conclusion suggests that negative life events are a risk factor for NSSI, and the type of rumination plays a crucial moderating role.

Keywords

Middle School Students, Negative Life Events, Non Suicidal Self Injury, Rumin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是指没有死亡意图的故意、反复伤害自身躯体，且不被公众所理解的行为，这种行为一般无致死性或致死性较低(Poudel et al., 2022)。该行为在青少年群体中日益突出，在我国中学生中，非自杀性自伤的检出率高达 14%~56% (杨冬梅等, 2013)。自伤虽然不会直接导致死亡，但多数研究表明具有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青少年更可能产生自杀行为(刘珍珍等, 2019)。国外的一项研究表明有过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青少年中，七成以上有过自杀的想法(Wolff et al, 2013)。根据自伤行为理论模型，负性生活事件是导致非自杀性自伤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Nock, 2009)。研究表明，个体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程度越深，出现自伤行为的风险也就越大(顾红磊等, 2018；张栋栋等, 2018；Reinhardt et al., 2022)。应激-易感模型认为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是个体的内在易感因素和外在应激源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Wasserman, 2001)。反刍思维是个体在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后经常出现的思维，当个体遭遇负性事件时，个体反复关注痛苦体验和思考事件因果关系被称为反刍思维(Nolen-Hoeksema, 1991)，其作为相对稳定的个体认知特质，能够在负性生活事件对个体的影响中起作用(刘慧, 2025)。纵观以往反刍思维研究，反刍思维似乎被概念化为一种单维度的消极人格特质或认知过程，而在个体反刍思维是否只存在消极意义这一点上，也有学者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认为反刍思维也存在合理、积极的一面。并编制量表将反刍思维分为积极型，消极型和低型(Yang et al., 2020)。基于应激-易感模型，本研究旨在探讨反刍思维作为个体相对稳定的认知特质，其在负性生活事件与非自杀性自伤的关系中的作用是否因反刍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以期丰富对反刍思维功能双重性的理解，为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风险评估与分层干预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实证依据。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福建省福州市某初中的学生为研究对象，于 2026 年 5 月发放问卷 403 份，回收有效问卷 382 份，有效率为 94.7%。其中男生 202 人，占总人数 52.9%；女生 180 人，占总人数 47.1%。在开展研究之前，对所有调查人员进行规范化培训，并且向参与者解释研究目的、方法和可能存在的风险，所有

参与者均自愿参与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2.2. 研究工具

2.2.1. 问卷调查法

由研究者进行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级、家庭所在地、是否为独生子女等基本信息。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本研究采用刘贤臣(刘贤臣等, 1997)编制的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list, ASLEC),用于评定青少年在过去一年内是否发生负性事件以及负性事件对其影响程度。该量表采用五级评分,ASLEC 分数越低代表被试受生活事件的影响越小,表现越好。本次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15。

非自杀性自伤问卷:使用渥太华自伤量表(Ottawa self-injury inventory, OSI)中的条目对非自杀性自伤进行界定(张芳等, 2015),要求回答过去一年,被试是否存在不以自杀为目的的自我伤害行为。根据每种自伤行为发生的频繁程度来选择选项。该量表采用五级评分。所有项目的分数相加后,分数越高者,越有可能发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本次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27。

反刍思维量表:采用杨宏飞(Yang et al., 2020)的积极和消极反刍思维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Rumination Scale, PANRS)。该量表采用四级评分。由享受快乐、积极应对、抑制快乐、否定自我、和消极归因组成积极反刍思维和消极反刍思维。前两者组成积极反刍,后三者组成消极反刍。本研究中采用 K 均值聚类分析将反刍思维分为 3 种类型(积极型、消极型、低型)并确定被试的反刍思维类型。本次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54。

2.2.2. 数据分析法

本研究对有效问卷采用 SPSS 软件对变量进行描述统计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并通过采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 中的 Model1 来进行调节效应的检验,验证不同类型的反刍思维在负性生活事件对非自杀性自伤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有 14 个因子特征根大于 1,其中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 21.27%,小于 40%的临界标准,所以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汤丹丹, 温忠麟, 2020)。

3.2. 一般人口学基本情况

本研究共纳入 382 名青少年被试,其中男生 202 名(52.9%),女生 180 名(47.1%);初一 172 名(45.0%),初二 125 名(32.7%),初三 85 名(22.3%);农村 86 名(22.5%),城镇 296 名(77.5%);独生子女 106 名(27.7%),非独生子女 276 名(72.3%)。

3.3. 初中生负性生活事件、非自杀性自伤及反刍思维类型现状

由表 1 可见,负性生活事件总分为(66.01 $\pm$ 19.78)分,非自杀性自伤检出率为 45.3%,积极型反刍思维占比 35.1%、消极反刍思维占比 27.5%,低型反刍思维占比 37.4%。人口学差异分析显示:人口学差异分析显示:负性生活事件在性别($t = -3.911, p < 0.001$)和年级($F = 5.585, p < 0.069$)上存在显著差异;非自杀性自伤在性别($\chi^2 = 26.462, p < 0.001$)和生源地($\chi^2 = 4.004, p = 0.045$)上差异显著;反刍思维类型在性别($\chi^2 = 7.668, p = 0.022$)和生源地($\chi^2 = 12.076, p = 0.002$)上存在显著差异。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nd rumination
表 1. 负性生活事件、非自杀性自伤及反刍思维的描述统计

变量	分组	例数[n (%)]	负性生活事件	非自杀性自伤检出情况	反刍思维		
					积极型	消极型	低型
					例数 [n (%)]	例数[n (%)]	例数 [n (%)]
性别	男	202 (52.9)	62.30 ± 19.96	66 (38.2)	83 (41.4)	54 (26.7)	65 (32.3)
	女	180 (47.1)	70.17 ± 19.30	107 (61.8)	51 (28.3)	51 (28.3)	78 (43.3)
	t 值		-3.911***	$\chi^2 = 26.462, p < 0.001^{***}$	$\chi^2 = 7.668, p = 0.022^*$		
年级	初一	172 (45.0)	62.31 ± 20.21	75 (43.4)	61 (35.5)	40 (23.3)	71 (41.3)
	初二	125 (32.7)	68.53 ± 19.48	66 (38.2)	45 (36.0)	39 (31.2)	41 (32.8)
	初三	85 (22.3)	69.79 ± 19.33	32 (18.5)	28 (32.9)	26 (30.6)	31 (36.5)
	F 值		5.585**	$\chi^2 = 5.348, p = 0.069$	$\chi^2 = 3.610, p = 0.461$		
生源地	农村	86 (22.5)	64.24 ± 19.82	30 (17.3)	27 (31.4)	14 (16.3)	45 (52.3)
	城镇	296 (77.5)	66.52 ± 20.08	143 (82.7)	107 (36.1)	91 (30.7)	98 (33.1)
	t 值		-0.911	$\chi^2 = 4.004, p = 0.045^*$	$\chi^2 = 12.076, p = 0.002^{**}$		
是否独生 子女	是	106 (27.7)	63.35 ± 18.48	49 (28.3)	34 (32.1)	37 (34.9)	35 (33.0)
	否	276 (72.3)	67.03 ± 20.52	124 (71.7)	100 (36.2)	68 (24.6)	108 (39.1)
	t 值		-1.687	$\chi^2 = 0.933, p = 0.90$			

3.4. 初中生负性生活事件与非自杀性自伤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表 2 可知, 负性生活事件总分与非自杀性自伤存在显著正相关, 负性生活事件中的各个维度均与非自杀性自伤存在显著正相关。

Table 2.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their dimensions with non-suicidal self-injury
表 2. 负性生活事件及其各维度与非自杀性自伤的相关关系

	1	2	3	4	5	6	7
1. 负性生活事件总分	1						
2. 人际关系	0.704**	1					
3. 学习压力	0.650**	0.704**	1				
4. 受惩罚	0.504**	0.481**	0.517**	1			
5. 丧失	0.440**	0.495**	0.473**	0.462**	1		
6. 健康适应	0.603**	0.614**	0.778**	0.388**	0.493**	1	
7. 其他	0.840**	0.843**	0.866**	0.649**	0.644**	0.802**	1
8. 非自杀性自伤	0.431**	0.389**	0.393**	0.280**	0.311**	0.394**	0.624**

3.5. 反刍思维在初中生负性生活事件与非自杀性自杀之间的调节作用

采用 SPSS 的 PROCESS 插件(Model1)检验反刍思维类型在负性生活事件与非自杀性自伤关系中的调

节作用。以低型为参照组，将反刍思维类型编码为两个虚拟变量，连续变量进行了均值中心化处理，采用 Bootstrap 抽样 5000 次估计置信区间。

根据表 3 可知，消极型反刍思维与负性生活事件的交互项显著($B = 0.100$, $SE = 0.021$, $t = 4.859$, $p < 0.001$)，表明消极反刍思维显著调节了负性生活事件与非自杀性自伤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与参照组相比，消极反刍型个体中负性生活事件对 NSSI 的正向预测作用更强。相比之下，积极反刍型与负性生活事件的交互项不显著($B = -0.023$, $SE = 0.024$, $t = -0.983$, $p = 0.326$)，表明积极反刍思维在负性生活事件与非自杀性自伤关系中未表现出显著的调节作用。整个回归模型显($F = 69.32$, $p < 0.001$)，共解释了非自杀性自伤总变异的 48.0%，其中交互项的引入使模型解释力提升了 5.0%。

Table 3. The mediating role of rumination between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表 3. 反刍思维在负性生活事件与非自杀性自伤之间的调节作用

变量	B	SE	t	p	95% CI
负性生活事件	0.076	0.015	5.121	<0.001	[0.047, 0.106]
虚拟变量 1 (消极型)	-5.299	1.525	-3.473	<0.001	[-8.298, -2.299]
虚拟变量 2 (积极型)	1.172	1.481	0.791	0.429	[-1.740, 4.083]
负性生活事件 × 虚拟变量 1	0.100	0.021	4.859	<0.001	[0.059, 0.140]
负性生活事件 × 虚拟变量 2	-0.023	0.024	-0.983	0.326	[-0.071, 0.024]
R^2				0.480	
ΔR^2				0.050	
F				69.32	

3.6. 反刍思维的简单效应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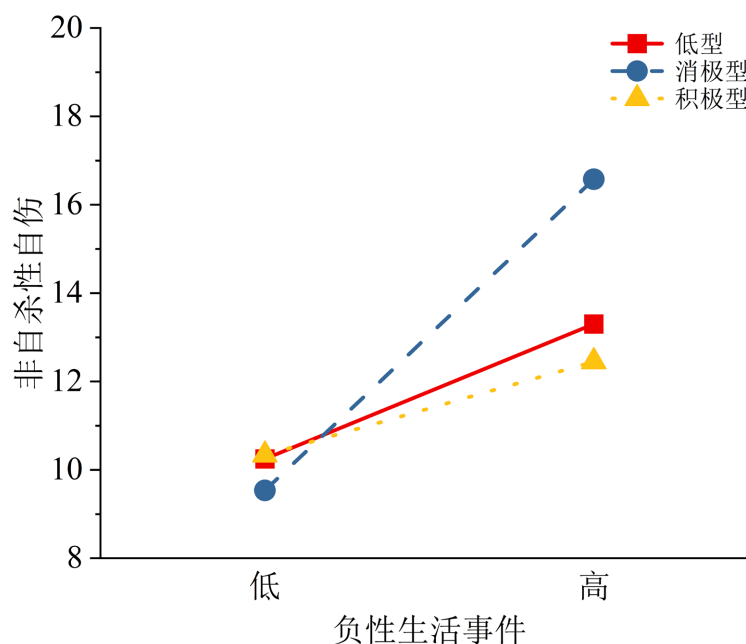


Figure 1. Simple slope plot

图 1. 简单斜率图

根据表 4 简单效应分析结果和图 1 简单斜率图, 调节变量的不同类型对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 在低型调节水平下, 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 = 0.076, SE = 0.015, t = 5.121, p < 0.001$); 在消极型调节水平下, 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效应最强($B = 0.176, SE = 0.014, t = 12.486, p < 0.001$); 在积极型调节水平下, 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效应虽然仍然显著, 但效应值相对较小($B = 0.053, SE = 0.019, t = 2.813, p = 0.005$)。上述结果表明, 调节变量的不同水平显著调节了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其中消极型调节水平下两者的关联最为突出。

Table 4. A simple effect test of rumination
表 4. 反刍思维的简单效应检验

调节变量	B	SE	t	p	95% CI
低型	0.076	0.015	5.121	<0.001	[0.047, 0.106]
消极型	0.176	0.014	12.486	<0.001	[0.148, 0.204]
积极型	0.053	0.019	2.813	0.005	[0.016, 0.090]

4. 讨论

4.1. 初中生负性生活事件、非自杀性自伤、反刍思维现状

女生负性生活事件得分显著高于男生, 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相一致(张小琳, 2024; 张婉晴, 2025)。这可能与性别的社会化情绪调节策略有关, 在面对负性事件时女生更偏向沉思型反应风格应对等内化策略来处理负面情绪, 这种方式使得女生对负性生活事件的主观感知更为敏感强烈(Nolen-Hoeksema, 2012) 随着年级增加, 负性生活事件得分增加。主要与学业压力的积累效应有关, 随着中考临近, 家长期待与学业负担同步叠加, 成为青少年的压力来源(陈丽桦, 2024)。

本研究中非自杀性自伤检出率为 45.3%, 在既往对于中国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研究结果的范围 14%~56%(熊庆等, 2023)中处于较高水平。进一步印证了非自杀性自伤在青春期群体中的高发性, 尤其是在初中阶段更为突出。非自杀性自伤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 女生的自伤检出率显著高于男生, 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相一致(刘浩, 2023)。一方面是男女情绪调节策略的差异, 另一方面社会角色理论认为, 性别角色差异源于社会对不同性别角色期望。女性被允许表达痛苦, 因此更可能报告自伤行为, 男性被要求隐忍, 即使有自伤倾向也较少求助或承认, 导致研究中男性非自杀性自伤检出率偏低(李国华等, 2021)。城镇学生比农村学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更多且差异显著, 这与以往研究一致(Li et al., 2022), 这可能是由于城镇学生长期处于相对优渥的物质与教育资源环境中, 其在成长过程中逆境频率和强度可能低于农村学生, 面对挫折时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较弱, 就更有可能选择非自杀性自伤的方式缓解这些负面情绪(郭丰波等, 2021)。

本研究中反刍思维类型, 男女生有显著差异, 男生较多为积极型, 女生则低型较多。这与以往研究一致(李凤仪, 2023)。从社会文化背景来看, 传统性别角色期待对男女生的情绪表达和认知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社会文化通常鼓励男性表现出坚强、理性和自主的特质, 这使得男生在面对困难时更倾向于通过积极的自我对话和目标导向的行为来应对挑战, 从而形成积极反刍的思维模式。而对于女性, 社会文化往往期待她们表现出更多的情感表达和人际敏感性, 这使得她们在面对负性事件时更容易通过人际互动而非自我反刍来调节情绪, 在生源地方面, 城镇学生较多积极型, 农村学生较多低型。城镇家庭普遍更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全面发展, 父母更倾向于与孩子进行平等的沟通和交流, 这种家庭氛围有利于孩子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和情绪调节能力。而农村家庭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 对孩子的心理需求关注不

足,加之部分农村学生为留守儿童,长期与父母分离,缺乏情感支持和认知引导,这使得他们在面对困难时更容易感到无助和迷茫,从而表现为低水平的反刍思维。

本研究中负性生活事件在生源地上差异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均来自同一学校中学生,而能够在同所学校就读的学生本身已经通过了一定的社会筛选,同时这些在校的农村学生与城镇学生在学校环境、日常作息、面临的考试压力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同质性,从而缩小了生源地间的差异。三个变量在是否独生子女维度差异不显著,根据资源稀释模型(Blake, 1981),家庭资源有限,子女越多,每个孩子获得的资源越少,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家庭教育观念的转变,非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在教育机会、心理健康服务等方面与独生子女家庭的差距正在缩小,独生子女身份的标签意义正在逐渐淡化(He et al., 2025)。非自杀性自伤和反刍思维在年级上差异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初中这个自伤高风险的阶段内(熊苑淇等, 2024)年级间的边际差异被高发期背景所稀释。同时,反刍思维是一种个体面对负面情绪和压力事件时的反应倾向。虽然青春期是个体认知能力和自我意识快速发展的阶段,但反刍思维更主要反映的是个体内部长期形成的认知图式或情绪调节习惯,而非随年龄自然演变的阶段性特征。

4.2. 初中生负性生活事件对非自杀性自伤的影响

负性生活事件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间呈显著正相关,且负性生活事件水平对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这说明负性生活事件是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危险因素,青少年遭遇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出现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一结果与之前研究结果一致(孔令玲等, 2023)。根据体验回避模型,当个体遇到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越容易产生各种负面情绪,而部分青少年将非自杀性自伤作为一种逃避负面情绪的方式,期望能缓解负性生活事件所引发的负面情绪(Chapman, Gratz, & Brown, 2006)。

调节效应的检验支持了反刍思维在负性生活事件和非自杀性自伤起调节作用的假设,且具体表现为消极型反刍思维显著增强了负性生活事件对非自杀性自伤的正向预测作用,而积极型和低型反刍思维的调节效应不显著。根据情绪级联模型(Selby et al., 2009),当个体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后,会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此时,若个体倾向于采用消极型反刍思维,则会与负面情绪形成循环。消极反刍加剧负面情绪,负面情绪又进一步强化反刍。在循环过程中,个体可能陷入自我厌恶的痛苦状态。此时,非自杀性自伤作为一种强烈的躯体刺激,能够帮助个体将注意力从消极情绪中转移出来,从而暂时中断循环过程,为个体提供情绪缓解。

认知-情境理论(Grych & Fincham, 1990)也为提供了另一个解释视角,对负性生活事件的认知评估决定负性事件对个体的影响程度,本研究中,反刍思维作为个体的一种认知评价和应对方式,在负性生活事件与非自杀性自伤之间起到了调节作用。消极型反刍思维代表了一种适应不良的认知评价模式。消极的思维模式会加剧无助感和自责感,从而增加非自杀性自伤的风险。相反,积极型反刍思维代表了一种较为适应性的认知评价模式,但本研究中其调节效应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积极反刍的有效性依赖于个体的认知资源和压力水平,在高度压力情境下,即使是习惯积极思考的个体,也可能因资源耗竭而无法有效调用这些策略。

5. 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虽揭示了负性生活事件、反刍思维类型与非自杀性自伤之间的关系,但仍存在若干局限,需在解释结果时加以审慎考量。

第一,横断面设计限制了因果推断。本研究中所有变量在同一时间点收集,因此无法推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尽管本研究基于应激-易感模型将负性生活事件定位为前因变量,将非自杀性自伤定位为

结果变量,但在横断面数据中,无法排除反向因果的可能性,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追踪设计以更可靠地检验因果方向。

第二,共同方法偏差可能对结果产生一定影响。本研究所有变量均通过青少年自我报告问卷收集,单一信息源可能导致变量间关系被高估。尽管本研究在程序上采取了匿名作答、平衡项目顺序等控制措施,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低于临界标准,但这一检验无法完全排除被试在作答时因社会赞许性倾向、情绪一致性效应或默认应答风格而产生的系统性偏差。特别是涉及非自杀性自伤这类敏感性行为时,被试可能因羞耻感或对后果的担忧而倾向于低报实际行为频率,未来研究可考虑采用多信息源设计。

第三,方便取样的方法限制了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本研究仅选取福建省福州市某中学的382名初中生作为研究对象,样本来源单一,在城市化水平、教育资源、地域文化等方面具有局限性,研究结论能否推广至其他地区或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群体,尚需进一步检验。此外,单一来源的样本在年级分布、家庭背景等人口学特征上的变异范围有限,组间差异可能因此被压缩,这或许是本研究在年级、生源地等维度上未能观察到显著差异的原因之一。未来研究可考虑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纳入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学校样本,以增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和可推广性。

参考文献

- 陈丽桦(2024). 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自我同情与非自杀性自伤的关系及干预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昆明:云南师范大学.
- 顾红磊,扶丹丹,路晓英,夏天生(2018). 负性生活事件对初中生自我伤害行为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心理发展与教育*, 2(2), 229-238.
- 郭丰波,杨子阳,高碧莹(2021). 青少年亲子依恋对非自杀性自伤的影响:自尊的中介作用. *心理技术与应用*, 9(12), 705-712.
- 孔令玲,鲍昱含,徐雯雯,郭靖,曲海英,徐娜,周玲,岳伟华(2023). 初中生非自杀性自伤与负性生活事件的关系及相关因素.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37(5), 405-410.
- 李凤仪(2023). 初中生父母忽视对社会适应的影响: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 硕士学位论文,南宁:南宁师范大学.
- 李国华,周勇杰,黄薇,周智凤,弓建,等(2021). 情绪障碍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性别差异. *中国预防医学杂志*, 22(9), 699-703.
- 刘浩(2023). 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一个链式中介模型. 硕士学位论文,济南:济南大学.
- 刘慧(2025). 初中生负性生活事件、反刍思维与非自杀性自伤的关系及干预. 硕士学位论文,昆明:云南师范大学.
- 刘贤臣,刘连启,杨杰,柴福勋,王爱祯,孙良民,赵贵芳,马登岱(1997).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的编制与信度效度测试. *山东精神医学*, 1(1), 15-19.
- 刘珍珍,汪心婷,刘贤臣,王泽颖,安迪,贾存显(2019). 自杀行为暴露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关系的纵向研究.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35(12), 1573-1577.
- 汤丹丹,温忠麟(2025).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问题与建议. *心理科学*, 43(1), 215-223.
- 熊庆,申秀云,阳红(2023). 述情障碍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非适应性情绪调节和抑郁的链式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31(3), 574-577.
- 熊苑淇,石宝堂,张沛宇(2024). 2711名初中生健康相关生命质量、负性情绪与非自杀性自伤的关系分析. *中国校医*, 38(10), 760-763+771.
- 杨冬梅,韩卫民,邵春昕(2013). 北京市通州区中学生2008~2012年自伤与自杀行为监测结果. *中国学校卫生*, 34(11), 1351-1353.
- 张栋栋,朱玉,阴文佳,陈玲,缪金萍,王力维(2018). 常州市护理专业新生负性生活事件应激量与伤害发生关系. *卫生研究*, 47(6), 962-965.
- 张芳,程文红,肖泽萍,刘文敬(2015). 渥太华自我伤害调查表中文版信效度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 35(3), 460-464.
- 张婉晴(2025). 初中生负性生活事件和焦虑的关系:自我同情的中介作用及干预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成都:成都大学.

- 张小琳(2024). 负性生活事件对初中生生命意义感的影响: 感恩的中介作用及教育干预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成都: 成都大学.
- Blake, J. (1981). Family Size and the Quality of Children. *Demography*, 18, 421-442. <https://doi.org/10.2307/2060941>
- Chapman, A. L., Gratz, K. L., & Brown, M. Z. (2006). Solving the Puzzle of Deliberate Self-Harm: The Experiential Avoidance Model.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4, 371-394. <https://doi.org/10.1016/j.brat.2005.03.005>
- Grych, J. H., & Fincham, F. D. (1990). Marital Conflict and Children's Adjustment: A Cognitive-Contextual Framework.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8, 267-290.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08.2.267>
- He, J., Zhong, Y., Song, Y., Luo, J., Lin, C., Wu, Y. et al. (2025). The Impact of Only-Child Status on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A Multi-Center Cross-Sectional Study Using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in Western China. *BMC Public Health*, 25, Article No. 2140. <https://doi.org/10.1186/s12889-025-23383-y>
- Li, R. F., Wang, Y. N., Huo, L. J., Lu, S. Q., Hao, J. et al. (2022). Mediating Effects of Suicidal Ide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mong Adolesc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The Roles of Sex and Urban-Rural Status. <https://doi.org/10.21203/rs.3.rs-1852442/v2>
- Nock, M. K. (2009). Why Do People Hurt Themselves? New Insights into the Nature and Functions of Self-Injury.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 78-83. <https://doi.org/10.1111/j.1467-8721.2009.01613.x>
- Nolen-Hoeksema, S. (1991). Responses to Depression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Duration of Depressive Episode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00, 569-582. <https://doi.org/10.1037/0021-843x.100.4.569>
- Nolen-Hoeksema, S. (2012). Emotion Regulation and Psychopathology: The Role of Gender.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8, 161-187.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clinpsy-032511-143109>
- Poudel, A., Lamichhane, A., Magar, K. R., & Khanal, G. P. (2022). Non-Suicidal Self Injury and Suicidal Behavior among Adolescents: Co-Occurrence and Associated Risk Factors. *BMC Psychiatry*, 22, Article No. 96. <https://doi.org/10.1186/s12888-022-03763-z>
- Reinhardt, M., Horváth, Z., Urbán, R., Rice, K. G., Drubina, B., & Kökönyei, G. (2022). Dissociative Tendencies Aggregate the Impact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o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mong Male Juvenile Delinquents. *Archives of Suicide Research*, 26, 226-244. <https://doi.org/10.1080/13811118.2020.1784335>
- Selby, E. A., Anestis, M. D., Bender, T. W., & Joiner, T. E. (2009). An Exploration of the Emotional Cascade Model in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18, 375-387. <https://doi.org/10.1037/a0015711>
- Wasserman, D. (2001). A Stress-Vulnerability Mode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icidal Process. In D. Wasserman (Ed.), *Suicide: An Unnecessary Death* (pp. 13-27). Martin Dunitz.
- Wolff, J., Frazier, E. A., Esposito-Smythers, C., Burke, T., Sloan, E., & Spirito, A. (2013). Cognitive and Soci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NSSI and Suicide Attempts in Psychiatrically Hospitalized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41, 1005-1013. <https://doi.org/10.1007/s10802-013-9743-y>
- Yang, H., Wang, Z., Song, J., Lu, J., Huang, X., Zou, Z., & Pan, L. (2020).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Rumination Scale: Development and Preliminary Validation. *Current Psychology: A Journal for Diverse Perspectives on Diverse Psychological Issues*, 39, 483-499. <https://doi.org/10.1007/s12144-018-9950-3>